

研究留學生，先擺脫思想框架

Stacey Bieler, “Patriots” or “Traitors”? : *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4. 527pp.

江勇振*

Stacey Bieler 所著的《是「愛國者」還是「漢奸」？：中國留美學生史》，是近年來美國學術界所出的第二本有關中國留學生的書。第一本是由史丹佛大學在 2001 年出版，葉維力(Weili Ye)所寫的《為中國而現代化：美國的中國留學生，1900-1927》(*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這兩本書所用的材料主要都是二十世紀前半段留美學生所出版的英文刊物：《留美學生月報》(*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但分析的重點和結論則有所不同。由於我們在此處只著眼於 Bieler 的書，本書評只會在相關之處提到葉維力的書。

這本書一共有 11 章，包括〈序曲〉和〈尾聲〉。〈序曲〉以 1870 年代容闈的幼童生作為引子，用他們學未竟功就被召回，不但不受重用，而且被打入冷宮的命運，來勾勒出本書的題旨：亦即，中國政府一向就對留學生抱持著疑懼的心裡，在需要的時候，利用他們；在不需要、或者在一心想要獨裁、政治鬥爭的時候，折磨、踐踏、草菅他們。接著，Bieler 就以編年的順序，從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開始，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討論到 1949 年共

* 美國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大學(DePauw University)歷史系教授

產黨革命成功以後留學生的遭遇。Bieler 在每一章裡，都各穿插了留學生的簡短傳記。這一方面增加了敘述的生動性，另一方面又幫助了作者在分析的過程中尋得焦點。第一章所討論的主題是留美運動再興的歷史背景，作為個案的是庚子事變以後到美國留學、後來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費起鶴。第二章討論的是清華學校，穿插的是留學西點軍校的王之、以及詩人聞一多。第三章分析的主軸是從上海到美國，作為例子的留學生是從事鄉村建設的張福良。第四章的主題比較分散，副標題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憂國憂民」。作為分析例子的包括：哈佛燕京的洪業、美籍華僑 Flora Jan、以及在紐約當牧師的 Huie Kin。Huie Kin 的 6 個混血女兒都嫁給中國留學生，也都隨先生到中國工作、定居。當然，這當中還有一個美國排華法律的因素在內。亦即：任何與中國人結婚的女子，就自動喪失她的美國國籍。

第五章所分析的是民主的實驗，作為例子的是外交官顧維鈞，分析的重點是中國留美學生的組織，亦即「中國留美學生聯合會」(The 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及其出版的《留美學生月報》。第六章的主題在於把留學生視為中美文化交流的大使，作為分析的個案是陳衡哲、胡適。第七章是留學生回國後的貢獻，副標題是：「科學救國」。作為分析的個案為在河北定縣從事平民教育的晏陽初、「中國科學社」的任鴻雋、在江蘇曉莊從事鄉建的陶行之、以及後來清華大學的校長梅貽琦。第八章的主旨在共產革命初成，中美斷交的開始，作者用來作為例證的是民主同盟的羅隆基、以及致力於古蹟保存的梁思成。第九章的標題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章前的引文是屈原的《離騷》。顧名思義，分析的主題是留學生愛國無門、愛國卻淪於被誣為漢奸的悲慘命運。〈尾聲〉所討論的，則是 1978 年以後中國學生再度赴美留學的情況，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意味。

Bieler 這本書所反映的，是中國 1980 年代改革開放政策以後所興起的翻案史學。從這個角度看來，Bieler 這本書，和葉維力在 2001 年出版的《為中國而現代化：美國的中國留學生，1900-1927》，都是中國翻案史學渡洋過海

到美國的產物。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對留學生的評價，一言以蔽之，是「崇洋媚外」、「奴化」、「文化買辦」。與之相對的，1980年代以後的翻案史學，其對近代留美教育的評價，則做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李喜所在1987年所發表的《近代中國的留學生》和孫石月在1995年所發表的《中國近代女子留學史》，就是這個新的評價方向下典型的代表。從改革開放的角度看去，留美學生不但不是從前宣傳之下所貶抑的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買辦，而且搖身一變，成為中國近代化過程裡的愛國先驅。當然，翻案史學承認留學生也有他們的缺點，他們當中也確實有崇洋媚外、或投靠軍閥和反動勢力的分子，但他們絕大多數都能潔身自好、勤奮努力，從學業上、從研究中為苦難的中國找出路。這個對近代中國留美學生給予正面評價的新趨向，隨著改革開放政策之下出國的中國留學生，也開始反映在美國的漢學界。從中國來留學，然後在美國定居、教學的葉維力如此，身為美國人的 Bieler 亦復如此。本書名為「愛國者」還是「漢奸」？就意味著 Bieler 和葉維力一樣，雖然在表面上是挑戰了過去共產黨對留美學生的負面評價，然而諷刺的是，在思維方式上，並沒有跳出中國19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所形成的思考框架。事實上，我們對二十世紀中國留美學生的評價，並沒有必要停留在他們究竟愛國還是漢奸、或買辦的二分法的思考框架裡。澄清留學生愛不愛國，或者為留學生平反，說他們並不是買辦，不但沒有助於我們對留學生的了解，這種思維框架反而侷限了我們的視野，妨礙我們去問一些更為深刻的問題，比如說：資源分配、留學政策是否與國家、社會的需要相配合、以及歸國留學生與社會疏離的問題。換句話說，「愛國」、「買辦」適足以使分析貧乏化，它是任何想要研究留學生這個議題的人，所必須最先擺脫的二分法和思想框架。

Bieler 在分析留美學生的時候，能夠不把留美學生當成一個渾然不分的一體，是超越了葉維力前引書。葉維力把留美學生當成進步、民主、有遠見的一個群體，Bieler 則點出了中國留學生之間，因為省籍成見而造成了彼此的傾軋。更嚴重的是，中國留學生和美國唐人街土生土長的華僑之間，不但有

省籍的成見，又加上了階級的偏見，彼此格格不入，屢有摩擦。令人不解的是，Bieler 雖然能注意到留學生在美國時的省籍和階級偏見，然而，當她處理留學生回國以後的情況，卻又把他們當成了一個渾然不分的整體。更有甚者，她完全忽略了留學生也是凡人，並不會因為留了學就對名譽、權力、利益趨於淡薄。她把留學生與民國時期的各個政權對立而分。於是，留學生有知識、技術，愛國、求改革、追民主。與之相對的，軍閥只知混戰，國民黨雖然較高一籌，則只要留學生的技術，不要他們的民主素養跟理想。殊不知這種二分法根本不能成立。當時誠然有少數歸國留學生有他們的理想和原則，但更多的留學生並不在乎與軍閥、國民黨共舞。在軍閥以及國民政府的機構裡，上至部會首長，下至省縣市級的長官，留學生所在多有。最諷刺的是，作者引了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Michael Borodin)的一句話：「任何一個中國的土匪，只要他能搖身一變成爲一個軍閥，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招買到夠多的歸國留學生來爲他組織一個政府。」（頁 329）鮑羅廷在這裡所冷嘲熱諷的對象是留學生，Bieler 引了這句話，卻把它當成是留學生因為回國失業，爲了餬口，不得已只好爲軍閥效勞的佐證！

二十世紀的留美學生是一個很大的題目，資料相當龐雜。整體的分析似乎是初期研究所必須經過的途徑。然而，顧及了整體，可能又略於細節，很難能達到見林又見樹的效果。爲了彌補這個缺點，Bieler 在分析、敘述的過程中，穿插了 14 位留學生的簡短傳記。這個方法的優點，在於它可以讓 Bieler 用具有代表性的留學生的生平，爲宏觀的敘述增添一些有血有肉的細節。然而，這個方法也有它的缺點：第一，選擇這些具有代表性的留學生的標準究竟爲何？Bieler 所選擇的 14 位留學生裡，有 9 位在文教界（費起鶴、聞一多、洪業、陳衡哲、胡適、任鴻雋、梅貽琦、羅隆基、梁思成）、3 位從事鄉村建設（張福良、晏陽初、陶行之）、1 位職業外交官（顧維鈞）、1 位軍人（王之），就在在地顯示出作者在取樣上是以結論作先導的。換句話說，這些取樣可以讓作者凸顯出留學生愛國、但自己的國家卻不愛他們的主軸。其次，

由於篇幅的限制，這些傳記，Bieler 頂多只能做到浮光掠影的敘述與分析，其結果是不夠深入，不能得到以深度分析與宏觀敘述相得益彰的效果。第三，Bieler 引用傳主自己所寫的自傳時，批判性不夠，因而她所反映的常是傳主主觀的看法。事實上，這種對留美學生過度「同情」、缺乏批判性、讓留學生「自說自話」的作法，貫串了本書，大大地減低了其論證的說服力。

本書最大的缺點，是它完全沒有批判性地面對歷來的研究成果。首先，對留美學生的批判並不始於共產黨。筆者在一篇文章裡已經指出：1920 年代以後，中國輿論和學術界對留美教育的批判，基本上是整個近代中國西化教育批判的一環。同時，對留美教育採取批判態度的並不都是左派的學者和人士。事實上，對留美教育大加撻伐的，不但橫貫了整個意識形態的界域，有左派、有右派、也有自由主義者，而且包括了西方人和中國人。¹1920 年代林林總總討論、批判留學教育的專文、論著裡，最具有代表性，同時也最具有說服性的，是舒新城所發表的《近代中國留學史》。英文著作裡，汪一駒先生在 1966 年所出版的鉅著，《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1872-1949》(*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是舒新城對近代中國留學教育批判的延續。汪先生這本鉅著決定了三十年來美國漢學界對近代中國留學教育的解釋。Bieler 並不是不知道汪一駒先生，她還徵引了汪先生的書。從某個角度來說，這正是中國 1980 年代興起的翻案史學的一個大問題，亦即，歷史的失憶症。由於 1949 年革命所產生的斷層，許多從事翻案史學的學者根本不知道 1949 年以前的研究成果。在中國出生、長大，到美國留學的葉維力如此是可以理解的；奇特的是，Bieler 身為美國人，居然亦不能免，可見翻案史學影響力的一斑。更有甚者，Bieler 不但沒有針對汪一駒先生的研究成果做批判或對應的工作，也沒有處理她跟葉維力是否有不同觀點的問題。當然，這也許多少跟美國學術著作出版一向曠日費時的問題有關。在美國，一本學術著

¹ 請參閱江勇振，〈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留美學生——一個在研究課題上初步的省思〉，收入李又寧主編，《華族留美史：150年的學習與成就》（紐約：天外出版社，1999），頁103-128。

作從送審、修改、到出版，常要耗掉兩、三年的時間。因此，雖然葉維力的書是 2001 年出版的，等 Bieler 看到這本書的時候，她自己的書恐怕也正在送審、修訂的過程中。如果情況果真如筆者在此所設想的，Bieler 應該在序文中略加說明。

最後，必須指出本書的一些錯誤。首先，Bieler 說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各校所組的同學會是「中國留美學生聯合會」的核心（頁 172）。這個說法是錯誤的。中國學生在美國各校所組織的同學會是獨立的，與「中國留美學生聯合會」沒有統屬的關係。一直要到 1925 年，「中國留美學生聯合會」才修訂憲章，把各校同學會納入聯合會的體系。然而，這個修憲條款雖然在該年的夏令會以些微的多數票驚險通過，但這項條款通過以後，卻幾乎激起了革命，許多同學會起而鳴鼓攻之。舉個例子來說，哈佛中國同學會在針對這個條款做了激烈的辯論以後，通過決議，聲稱哈佛中國同學會不隸屬於「中國留美學生聯合會」。²當然，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Bieler 這點沒弄清楚並不足以為奇，因為當時大多數的留美學生對這點也不清楚。連自己曾經是留美學生當中的活躍分子之一，而且終生在紐約當「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of America)社長的孟治，都不知道留美同學會從不隸屬於「中國留美學生聯合會」。³

其次，Bieler 在書裡提到了陸秀貞。陸秀貞是二十世紀初年留美學生裡的翹楚，她不但當過《留美學生月報》的助理編輯，還在 1908 年當選了「中國留美學生聯合會」的副會長，雖然她後來辭了職，原因可能跟性別有關，這點在此暫且不表。Bieler 說陸秀貞於 1910 年回國，在上海「中西女塾」教書，不到一年以後過世（頁 185）。Bieler 之所以會犯了這個錯誤，問題可能出在《留美學生月報》1911 年 3 月號歡送陸秀貞回國的頌詞。因為這篇文章用的多半是過去式的時態，因此被 Bieler 誤讀成一篇訃文。⁴事實上，陸秀貞至少

² “Student World: Harvard,”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21:7 (May 1926), p. 81.

³ 孟治，〈留美學生現狀〉，《中華基督教會年鑑》（上海，1927），頁 64。

⁴ “Notes and Comments: Miss Sieu Tsung Lok,”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6:5 (March 1911), p. 480.

在 1915 年編撰《遊美同學錄》的時候仍然健在。她與張履鼈結婚，張也是留美學生，曾任《留美學生月報》的主編。1917 年出版的同學錄，記載他在漢口當律師，他們夫婦應該就住在漢口。⁵

最後，本書在人名上有若干也許是校對疏忽、或者是修改不週所引致的錯誤。晏陽初的名字以三種不同的形式出現：James Yen, Yan Yangchu, Yen Yangchu（這個拼法把韋氏拼音跟中國政府制訂的拼音混在一起）。從某一個方面來說，這是研究民國時期人物的一個問題，特別是那些出了名，又中英文姓名並用的人。如果當時有人用了自己獨特的拼音，我們是否應該尊重本人？還是為了一致性，不管晏陽初自己稱自己為 James Yen 或是 Jimmy Yen，一切以目前約定俗成的羅馬拼音為準？即使如此，是用韋氏拼音，變成 Yen Yang-ch'u？還是用拼音，變成 Yan Yangchu？晏陽初在 Bieler 這本書裡之所以會以三種不同拼音的形式出現，一方面可能反映了應以何者為標準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考驗了研究者是否熟稔所有不同的拼音制度，而能夠游刃有餘地來回換用。此外，本書還有一些其他的小錯誤。例如：楊銓，不是楊傑；「德先生」、「賽先生」，不是「科學民主人士」；岳飛，不是嶽飛。

⁵ 北京清華學校編，《遊美同學錄》（北京，1917），頁119。